

book

# 还原一个本真中国

□徐瑾

毫无疑问,一个世纪前积弱多难的黄土中国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最热门的话题、一块似乎处处是商机的热土。有关中国的报道抢占了世界财经报刊的重要位置,气势逼人。中国概念为无数风险资金所追捧,好像从每个音节中可以听出银子跳跃的悦耳叮咚声;同时老牌制造业国家往往视中国为洪水猛兽,是掠夺世界工作机会的噩梦。中国世纪真的到了吗?

环球冷热两分天地,不少国家经济仍徘徊在停滞的阴云之中,中国经济已保持9%以上持续增长近20年,但对中国经济质疑和礼赞从来没有停止,2001年流行章家敦的

《中国即将崩溃》,风水轮换,到了2006年呼声最高的却是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中国经济,沙上城堡抑或世界工厂,谎言还是奇迹,在外人眼中,是一个充满暧昧的手势。

瑞银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则冷静得多,他试图还原神话,在极端之外寻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解释:中国经济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与众不同。乔纳森·安德森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曾与胡祖六著书论证“中国威胁”之虚妄。今年他的《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延续他的平实持中风格,指出中国经济在总体上更为接近撒切尔的自由体制风格,比如目前政

府已经没有兴趣控制100%股份。中国到2025将成为第一大贸易国,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延续“亚洲奇迹”的路径,所以中国不会吞噬全球的制造业,更不会成为世界市场上通货紧缩的输出源头。

和日本一样,中国也是靠制造业起家,不同的是,日本在技术上占优势,中国的优势则体现在低廉的劳动力上,在出口方面大多是依赖轻工业产品。如果根据比较优势定理,劳动力密集的外包才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所在。尽管这样,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夺走工作机会,其实最基本的经济原理都可以向我们说明,国家间贸易的分工依赖比较优势,中国付出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换来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源,最终结果将是促进全球财富的增加。冷静地看,中国的世界工厂之梦在今天仍旧有些遥远,或许立足本土的制造业中心的定位更为准确。但是籍国内广阔市场的支撑,已经足以让中国走得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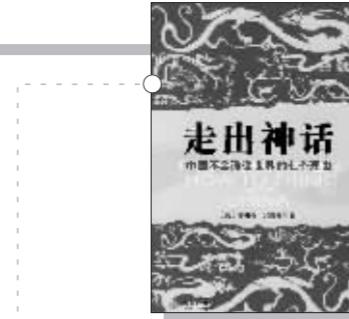
近年来人民币的坚挺表现,使得人民币在某些亚洲地区受欢迎程度超过美元,所以不少人担忧人民币会成为世界货币。事实上,任何一种能成为世界货币的货币,首要条件是能够自由完全的可兑换。在瑞银的标准中,如果以十分表示经济体完全禁止外资流动的话,那么中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可以打到九分,远超亚洲其他国家。现实世界的货币流动问题,并非保守与开放的概念之争,而是国家利益的权衡。以亚洲国家来说,在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系统尚未健全之时,货币开放并不明智,风险过大,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殷鉴不远。所以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当局并没有追求货币自由化的动力,人民币的改革路径依旧漫长。

对于中国来说,追求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理想并不那么有诱惑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发展国内金融市场,才是当务之急。以银行业来说,尽管目前不断整治,但是地方政府与银行机构的利益联系,往往成为过度投资与不良贷款的源泉,有的海外机构甚至推测历史遗留坏账可能达到40%,政府注资关系损害人的利益,而且也非一劳永逸之策。毕竟,如何逐步补充资金,最后达到市场化,才是正解。

今天的中国,多少总让人想起当年的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经济达到巅峰,日本奇迹一样被认为与众不同,全球的企业都在学习日式管理。日本工业新贵的资本游走世界,大肆投资,大有买下美国之势。1989年,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合写一本令舆论哗然的书,《日本可以说不》,评判美国的贸易政策,自诩以日本制造业之冠绝全球,自当傲视天下,可以对世界说不。可惜好景不长,意气风发的言论刚出,九十年代美国科技经济勃发,日本经济则泡沫挥发,低迷至今,“日本第一”的国家景象昙花一现。

分析日本企业当时海外并购强潮,除了自身经济强劲之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1985年的“广场协议”。因为协议规定日元汇率由1美元兑240日元升至120日元,日元相对美



《走出神话》  
——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  
(美)乔纳森·安德森著  
余江译  
中信出版社 2006年8月出版

元升值,所以日本资本海外收购成本大为降低,同时升值也削弱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在日本可以说不发行十周年之际,世界在纷纷讨论中国的崛起,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经济规律的必然。安德森预计中国今后20年将保持8%增长率,在世界经济中比重达到1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改写世界经济增长史,不过是世界经济要角轮而已。对世界说“不”需要实力,更需要牺牲,中国与其说是不能说“不”,不如说是不必说“不”,这正如世界也不能对中国说“不”道理一样。所以,尽管中国的立场与其他国家有多少不同,事实上中国正在成为和平世界的重要推手,道理很简单,当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贡献分别超过三成时,中国经济的自由化速度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有望成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典范。

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所指出的,世界价值观的确立已经由原来的指挥与控制日益转为横向模式,也就是通过沟通与协作来确立。今日的地球,早已经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冷兵器时代你输我赢的争斗观念已经过去,最佳策略是谋求共赢。

## 如果哈耶克骑着毛驴到中国



《风险投资家环球游记》  
(美)吉姆·罗杰斯著 凌建平 胡利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出版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  
(美)吉姆·罗杰斯著 刘昕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4月版

□黄章晋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为哈耶克设计的中国之行路线是,从帕米尔高原入境横穿新疆,再沿河西走廊继续东行。是否需要到北京后再南下,视哈耶克本人的意愿。进入中国的年代我希望最好是在1930至1935年。

选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慢慢一路走,然后写下他的观感,当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感同身受”这话绝对是靠不住的,越是日常生活惯而熟悉的东西,越会被忽略,只有陌生的东西,人们才会充满好奇地细致描述对它的感觉。因此,探究历史细节,往往局外人的描述和感受是很重要的参照和补充。

游走的路线,我手头有布鲁斯和吉姆·罗杰斯两位的游记,作为参照,自然哈耶克当走同一路线。

大英帝国下级军官C·D·布鲁斯在1905年秋天到中国游历。这位瞎嘴饶舌的白人,发现那时中国货币的复杂程度只有金融家才对付得过来:铜钱有大钱小钱之分,而各地的铜钱都不一样,往往不能在异地流通;白银更不是布鲁斯熟悉的铸币,白银与铜钱的比值各地不一。最糟糕的是白银成色并不一样,而且,同一块碎银子在每个回民手中的秤上读出的数字都不一样。

这些细节似乎印证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序言中转述中国人严重缺乏商业诚实的文字。但我不喜欢“国民劣根性”这种偷懒的结论,因为把种种不同历史环境中的长期作用而积淀下来的习惯简单归结为文化原因,其实只得到了一个无意义的结论。

所以,如果哈耶克能出现在布鲁斯的队伍里,当然最理想不过,那个时代,在许多哈耶克信徒眼中,中国的金融是最“市场化”,最无政府干涉的,除了少数几个时候的特例,80多年之后,又一位美国人沿

着几乎同样的路线穿越中国。政府不铸造色不足的铜钱以牟利。当然,这种混乱恐怕也非今人所能想象。

如果哈耶克是这个时候抵达长期币制混乱的中国,我相信这一定不会影响他后来总结的那个著名结论: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使得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垄断权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货币来,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相反,如果让自由竞争的各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则由于它们会关心自己所发行货币的币值稳定,因而可以避免过量的货币发行。因此,货币应当让自由竞争的私人银行来发行。

也许,哈耶克会对中国混乱币制的历史成因发生好奇,他甚至会发现,随着中国主要依赖的铜矿越来越靠南,铜钱运出成本越加高昂,会造成南北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如果哈耶克更早5年进入中国,他抵达北京时,清廷正在讨论币制问题,若哈耶克接受皇帝咨询,我相信他会提出国家采用金本位或银本位统一币制,以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代替铜圆和碎银。

前面不是安排哈耶克1930至1935年骑着毛驴进入新疆吗?30年后,把布鲁斯搞得晕头转向的复杂金属货币依然存在,而且货币体系事实上更复杂了,因为标以金属货币单位的纸制货币也开始并行流通,一部分为官方所发行,一部分为当地商号发行。但哈耶克该能敏锐地发现积极信号:仅仅30年,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开始被市场接受,虽然这些货币可能各自分别采用十进制、十二进制、十六进制,但如果这些纸币最终消灭金属货币,并且各自做到辅币的统一,相比以往,复杂程度已是呈几何级地被简化。

安排哈耶克1930-1935年骑着毛驴到中国,该是个伟大浪漫小说的题材。在我这里,哈耶克被安排的任务,只是要在提出看似迥然相别的总结和建议时,顺带把外在环境、条件的根本不同说一遍。因为有时那些抽象的结论被不附带外在前提和条件被说出来,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可以用在任何地方的。

当然,哈耶克还是有可能懒得废话:没办法,经济学是有原罪的,它虽与我们每个人相关,但对很多人来说,它又实在太深奥,因此最好压根就不应该要他们知道。否则,对他们来说,就好比土大仙原来是被王母娘娘附体,在看过科普手册后,又改为外星人附体了。

■新书过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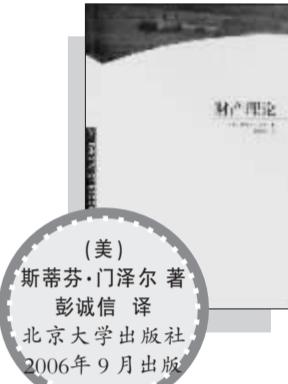
## 《华为的世界》



从注册资本2.4万元人民币的代理商成长为60亿美元营收的准世界级公司,华为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与联想、TCL等企业一道,已经是“中国崛起”在商业领域的具体体现。但华为老总任正非一向不愿意把华为的成功故事拿出来分享,不希望其他的企业来学习华为,任正非或许是对的。从“华为基本法”到“狼性文化”,再到“集成产品开发(IPD)”和“海外市场”,华为每一个阶段的成功,都会不由自主地成为其他企业的榜样,但是,学习者从来也没有复制出同样耀眼的成功。其实呢,华为应该被学习的是贯穿细节的“逻辑”,或者说是在走向世界级企业过程中用成功和

教训标示出的“道”。华为的成熟更多体现在危机之前的未雨绸缪和循序渐进,体现在意志坚定的持续变革。因此,相对于“华为做了什么”而言,“华为为什么这样做”才会让中国企业找到“学习华为”的最大价值。

## 《财产理论》



在原始社会,所有的需要都因大地的丰饶而得以满足,在金子发现以后,这种和谐被人类的贪婪所破坏;因而,人们把秩序加诸于己身以避免争执,保护个人得享“他的”那一份。古罗马著作中唯一显然的财产观念是西塞罗给出的,看法与上述的相似,西塞罗把世上的物品比作剧院中的座位:“尽管剧院是公有之物,我们仍然可以说每一个人就座的是‘他的’座位;国家和世界也是这样,尽管它们也是公有财产,但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用以反对如下观念,每个人的物品是他自己所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法学教授斯蒂芬·门泽尔的这本《财产理论》,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财产理论梳理了一下,博采众长,提出了关于财产的多元主义正当性理论,为减少财富不平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 《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的清淡性质的书,探讨组织中国人的问题,提出了中国企业文化能力模型,解剖了涵盖国家层面、传统层面、海外华人层面三个组织失败的案例。中国为什么没能缔造富有竞争力的组织?与此类论著通常在成本、物流、技术等问题上分析的观点不同,作者痛感中国只是在大量的技术上模仿与学习,却没有着力于创造新的精神资源,因而再三强调价值观、信念和文化的力量,强调虚无的重要性。财经作家吴晓波评论说,管理学现在已经成了一门泛滥而喧嚣的赚钱行业,但中国有没有认真在做学问的管理学教授?如果说有,肖知兴教授应该是令人敬重的。

## 《反思》

——南方高科被查封真相



南方高科2005年6月被查封或许将是一个标杆性的事件。它直接暴露了国产手机在几年风光背面隐藏的深层次隐患:价格战之痛,核心技术之痛,渠道之痛……国产手机在很多环节上没有自己的技术创新,仅仅依靠“制造”与“组合”,而核心技术的无根以及失去了核心技术的任何市场竞争都只能是哗众取宠,不可能持久的。对此,要是我们仅止于对外在的风雨悲叹而对其自身“躲藏”而不坚的脆弱品质视而不见,那么这种认识本身就是最大的败因。作为在南方高科工作4年的员工,作者亲历了南方高科从“复兴”到“辉煌”再到衰退的全过程。他对事件的总结,如果能够被包括国产手机在内的

各行各业的人们好好汲取,对国产手机业重整山河,将是治疗创伤的最好药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或许正是一本恰逢其时的、极为生动的企业生命哲学之教科书。